



诗人瞿秋白

侯 涤



文化传承与创新

在中共早期革命家中，瞿秋白是最具文人情结和诗人气质的共产党人。他端庄儒雅、一介书生的清秀，他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讲课，他学贯中西、多才多艺的学养，以及他所留下的 500 多万字的文学艺术、政治理论著作和译著，注定他是一个书生政治家、文人革命家，也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浪漫的诗人领袖。

我们称瞿秋白是诗人，不仅在于他一生创作、翻译了 80 多首诗词、歌谣，更在于他有着诗化的心灵、诗人的气质——真诚、美好、敏感、激昂。瞿秋白短暂人生的一多半都在投身革命运动，大量的精力都是为革命的实践活动撰写政论文，他的诗歌创作相对于一生从事诗歌创作的诗人来说，数量上是不多的，但他的诗传递了他生命历程的人生体验，也给我们提供了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革命别样的视角，更为后人留下一片丰富的鉴赏探索天地。

一、诗意江南走出的诗人秋白

瞿秋白 1899 年 1 月 29 日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士大夫家庭，瞿氏家族是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官僚家族，研





习四书五经、经史子集，拥有才艺、会琴棋书画是这个家族的学风。瞿秋白叔祖父瞿庚甫、伯父瞿世璜、父亲瞿世玮都擅长书画，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和《现代画家传略》中都载有：瞿世玮，山水画家，瞿世璜，篆刻家。

瞿世玮虔诚的道家思想对秋白一生有较大影响，也融入了瞿秋白以后的文化思想中，这些在瞿秋白以后的诗作中有很大的反映。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很多来自思维和思想，母亲对儿子的影响更多地是一种感性的认知过程。瞿秋白的母亲金璇，出身于江阴名门，熟读诗书，对诗文有相当高的鉴赏能力，能填词作诗，写信作文，落笔成章。小时候，母亲金璇常常会教孩子们识字，让孩子们吟诵短诗，讲《聊斋》，说《三国》。瞿秋白幼时对文学的钟爱，更多地来源于母亲的启蒙。秋白在庄氏塾馆读书时，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他都能熟读、背诵。所以，瞿秋白对古体诗词的撰写是与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的阅读氛围分不开的。

瞿秋白 5 岁在庄氏私塾接受了中式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6 岁转入冠英小学堂就读，以后又跳级就读常州府中学堂，这两所学校在当时均为带有西式教育理念的学堂。从小学到中学，瞿秋白与同时代的学子一样，所受的教育带有新旧两种色彩，既有很深的国学基础，又汲取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虽然瞿秋白不满意中学时代欧化式的“死的科学教育”，但是常州中学许多科目和注重开拓智力的课外活动，以及参加过辛亥



诗人瞿秋白





革命的校长的反抗封建专制、要求民主共和的思想意识,都对他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常州府中学堂,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第一任校长屠元博的革命进步思想和第二任校长童伯章的西式素质教育理念,对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和学识素养起了首要的作用。他对旧制度的痛恶,对新思想的追求;对文艺的喜好,对文史的偏爱,都来自这两所学校的教导。瞿秋白曾经对同学羊牧之说:“我们要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要知道孔子的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南北朝佛学,宋明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么能算一个中国人呢?”从这里,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瞿秋白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熏陶很深、很浓;他对国学的看重,对史学的热爱;对知识的需求,对学识的严谨。在他以后的散文、诗歌中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

瞿秋白诞生时,头顶生有两个漩涡,俗称“双顶”。因此父母为他取名阿双,学名瞿双。秋白少年时代,家里庭院的台阶旁栽有菊花,“一角花篱,几盆菊花”,“菊花的清香映着满地琐琐碎碎的影子。”他很喜欢这些菊花,把自己的名字“双”改为“霜”。后来又改为秋白。正像李清照的清照二字有出典之处一样(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秋白二字似也有出处,分别可从李白的五绝





《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和杜甫的五律《月下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得来。

瞿秋白 13 岁时所作《白菊花》:“今岁花开盛,宜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这首律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水墨国画,一盆独立寒秋的傲菊状态,让我们感受到这位少年的才气和心志。首句,一个“盛”字,渲染了菊花怒放的状态,紧接着,只有白玉盆才配高洁的菊花,显现作者孤傲的心气。后两句“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一直以来,人们给了两种解释,一是秋色太淡,花瓣上还没有能找到霜花凝露的痕迹;二是由于深秋未到,菊花还没经历风霜,仍在绽放着美丽的姿态。但笔者认为,写此诗时瞿秋白已经是经历了由富家少爷落魄成寄居祠堂,靠典当、借贷来度日的穷孩子,此刻的心情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只为赏花而作诗的悠然状态,他所要表达的和所要寄情的是在家庭落寞、生计维艰的情况下,那种不甘入俗流而甘受清冷的风骨,他要向菊花那样,耐寒、高贵。在诗中,他很自然地嵌入自己的名字“秋白、霜”,来寄托此刻的心志。

1916 年,秋白 16 岁时,这个士大夫家族中的一支完全破败,41 岁的母亲不堪贫穷与债务相迫服毒自尽。几个月后的清明,秋白留下了一首《哭母诗》:“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亲情在贫困中消失,布衣蓝衫添新泪,饥寒的游



诗人瞿秋白





子在清冷的灵堂为挚爱的母亲守灵。诗歌用了写实的手法,描述了家道中落,人情淡薄的封建旧家族亲友势利。至情至感,悲情伤痛,催人泪下。

1932年12月,瞿秋白在上海将自己于1917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就读时写的一首诗书赠给鲁迅先生:“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苦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作者又一次以北国冬雪的严寒凄冷烘托自己心情的惘然和凄苦。家境的破落,母亲的离世,家人的星散,自己辍学谋生,“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然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瞿秋白曾这样记录:“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隔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

“江南旧梦”,少年时代家乡的美景,当年“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耳鬓厮磨浓浓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环溪的清流禾稼”,“红梅翠竹,天宁古刹”,都已是烟云,心灵充满着迷乱、颓唐和无所归依之感。

我只能在这寒夜里,沽酒折梅,在酒和梅的陪伴中,酣睡,派遣愁情。

整个诗作,瞿秋白表现了在“五四”前夕,中国知识青年的茫然和痛苦,对旧制度、旧世界的痛恨,在昏暗迷茫中的探索。





1932年，瞿秋白在上海认识鲁迅，两人一见如故，瞿秋白将自己这首诗送给鲁迅，并在后面写上跋语：“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魏凝”。鲁迅先生，是瞿秋白生命中最值得信赖和引为知音的挚友，鲁迅、瞿秋白家世状况差不多，都为破落贵族子弟，把自己的心事、心境完全地告知鲁迅，不仅仅是瞿秋白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对象，更是瞿秋白找到一个能彼此慰藉、彼此滋养、彼此成就的人。所以，瞿秋白急于想坦诚地把自己介绍给鲁迅先生，用这首诗送鲁迅就是最好的自我介绍。日后，鲁迅对秋白人品的钦佩和对秋白文章的赞赏，溢于言表。

瞿秋白曾仿鲁迅的笔调撰写杂文，鲁迅看过后，用“鲁迅”笔名发表，这就是瞿秋白写的杂文《王道诗话》。在当时的文化界，能够让鲁迅赞道的，唯有瞿秋白。鲁迅说：“中国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他特别推崇秋白的俄文翻译，称：“著者和译者，并世无两。”可见瞿秋白的人格魅力和才学之高。鲁迅还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赠与秋白，更表明了两人友谊的挚诚。

鲁迅比瞿秋白长18岁，但他们的友谊为后人仰慕，堪称为“文坛双璧”。1933年，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序言》。瞿秋白是中共党内第一个全面、公正、科学地评价鲁迅及其杂文的人。



诗人瞿秋白





二、革命豪情激发秋白的诗情

瞿秋白的诗,从13岁的学子试笔到36岁的狱中绝笔。期间,无论是旧体诗、新诗,还是歌谣,抑或翻译作品,处处都留下他的生命印记,呈现其内心生活的变迁,其中部分诗充满着对人生的体验、生命的感悟。

1921—1923年,是瞿秋白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也是“五四”以后瞿秋白新体诗创作的高峰,一共11首诗作,主要反映了青年瞿秋白对人生的探索。这也是瞿秋白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世界观转换、改造、形成的过程。比如《远》《来去无牵挂》等,都是反映瞿秋白在空泛的旧民主主义和博爱的世界观的矛盾中探索的过程。到了苏俄以后,瞿秋白呈现的是,对俄国文化的极大兴趣和热衷,这些诗作记录了瞿秋白与前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们的交往,呈现了瞿秋白旅俄期间的感悟。作品有《秋意》《皓月》《俄雪》《海》等。

1921年,瞿秋白作为旅俄特派记者来到莫斯科,俄罗斯文化艺术深深地吸引了这位东方学子,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名人故居,瞿秋白置身在“名画如山积,山水林树”的艺术殿堂,瞿秋白没有想到,这里陈列着俄国著名美术大师的作品,这些珍贵的艺术精品,在连年动荡的苏俄,竟然丝毫未损。他说:“置身其中,几疑世外,并火革命之中,还闪着这一颗俄罗斯文化的明星。”同样,瞿秋白把自己当做一个文化使者来往于俄国文化人之间,他拜访诗人、作家、艺术家,与著名诗





人马雅可夫斯基交流，接受马雅可夫斯基送的诗集《人》。

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的孙女。瞿秋白到莫斯科不久，经人介绍与她相识。苏菲亚盛情邀请瞿秋白去莫斯科的托尔斯泰故居陈列馆参观，并到苏菲亚家中做客，苏菲亚的母亲很热情地接待了瞿秋白一行，并赠送书籍给瞿秋白。交流中，苏菲亚的母亲还告诉瞿秋白，在俄国，各种社会的公共设施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有政治上的危害作用，比如托尔斯泰陈列馆，都不受苏俄政府任何妨碍，有事还能获得资助。这也证明了苏俄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很好。

为答谢苏菲亚的友好接待，瞿秋白为她写了一首五言旧诗《皓月——题画赠苏菲亚·托尔斯泰》：“皓月落沧海，碎影摇万里。生理亦如斯，浩波欲无际。”

这首诗，表达了瞿秋白对托尔斯泰本人及其思想、创作的缅怀、景仰和赞美。瞿秋白借皓月沧海、碎影闪烁的自然美，传达他对托翁心灵的碰撞、思想情感的贯通以及希望托翁与自然同存、永生的美好愿望。

再看作于1922年3月的新体诗《海》：“人生涵大梦，瀛海衍寰区，夜来，声汹涌，高潮拍岸狂驱。／天声遐迩，敦诫吾人，沙岸里，魔舟复生。狂澜四海，突将生意，入汪汪墨浪无垠。／天际明星燃，隐隐窥深里；浮浪四围高，沉拍见无底。”

这首诗写于作者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住院期间。诗分三节，明写大海，暗喻人生，以大海的容含、声威、变化，



诗人瞿秋白





宣示人生的奇幻、生机和追求。“人生涵大梦”，这个“大梦”内涵十分丰富，既表明人生奇奇幻幻，朦朦胧胧，奥妙无穷，又说明人生变化多端，艰险壮烈，富有理想。“瀛海”的充盈、浩瀚、声浪汹涌，高潮狂驱，似乎在告诫世人，大海的狂澜能席卷、孕育一切生机，离开了汪汪墨浪，魔障之舟便会在沙岸复生。天上的明星想窥视大海的深浅和奥秘，但是浪涛起落如山如谷，是无法看见底的啊。诗人静卧病榻，细思社会变化，感悟人生万象，所要抒发的正是蕴积在内心深处的对自然与人生思考所欲宣泄的情思和哲理。

1923年底至1934年间是瞿秋白诗歌创作进入激昂、豪迈、真情勃发的时代，这个阶段，瞿秋白不仅获得真挚的情爱，而且在我党的革命历程中，瞿秋白正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他开始进入中共高层，成为中央局成员，作为共产国际看好的人才，来往于上海、广州，传递共产国际的指令，商讨国共合作。

1923年在南京参加共青团二大的时候，瞿秋白认识了两个爱好文学的女青年——丁玲与王剑虹。在频繁交往的过程中，王剑虹恋上了儒雅、端庄、都市绅士形象的瞿秋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他，回自新气俄乡，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渊博的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他的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羨敬重，但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正是因为这首诗，使瞿秋白和王剑虹之间的暗恋变成了热恋。他们的爱情至情至性，真切感人，堪成绝唱。





1923年,当时我们党的中央所在地是上海,瞿秋白作为我党早期的革命家,经常来往于上海、广州,这是第一次国共商谈合作事项期间。无暇与妻子朝朝暮暮的瞿秋白只能用书信来表达自己的牵挂和爱情。12月,瞿秋白在广州给上海的未婚妻王剑虹写了一封信,在信里,瞿秋白用布纹纸写了一首情诗——《七绝·赠王剑虹》:“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这首用旧体诗写成的情诗,虽然只是随意的寄情抒怀,并不是用来发表所作,但其内含却完全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有的情怀的自然流露,洋溢着对大好革命形势即将到来的欣喜和置身其间的自豪。它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而是一首抒情述志诗,象征着青春、热烈、理想和奋斗,是瞿秋白追求光明、许身革命的心声和誓言。

诗的前面两句是写景,借景抒情。花草、树木都迎着料峭的春寒绽放新绿,南归的燕子也正在忙碌着衔泥筑窝了,暗喻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正在兴起,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正在酝酿。国民革命的春天就要到来。后面把自己比作江南春燕,为自己的新生活,美好的、幸福的爱情,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要鹏飞上云霄。

从这首诗里,我们感受到青年瞿秋白对爱情生活的美好追求,也感受到青年革命家此刻高昂、豪迈的革命激情。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瞿秋白不仅创作了10首旧体诗,而且创作了《赤潮曲》《铁花》等6首新体诗,以及



诗人瞿秋白





他人生创作中的全部 14 首歌谣说唱,从这些诗作里,我们看到“五四”以后,一群年轻的革命家的蓬勃的朝气,洋溢的才情,对新生活的热爱,在大革命中的激情。

如果说瞿秋白常以新诗表达昂扬斗志的话,那么古体诗词更表达了他身处那个复杂时代、复杂情势下迷惘、颓唐、悲凉、沉痛、难以控诉一类的心境。但也并不都是如此。他的《七绝·赠王剑虹》就极具自信的革命乐观主义者的情怀,读来令人赞叹。



在这期间,瞿秋白还翻译了《国际歌》。《国际歌》是法国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 1871 年创作的无产阶级的战歌,歌词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毒蛇猛兽”吃尽了劳动人民血肉的暴行;阐明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是劳动群众“创造了人类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达了公社英雄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要为真理而斗争”的决心;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战斗,必然能使“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伟大真理。1888 年 6 月,法国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为这首诗歌谱了曲。从此,《国际歌》就响彻全世界,激励着各国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勇斗争。1902 年,俄国人科茨首次将它译成俄文。1923 年,瞿秋白从苏俄回国后,住在堂兄瞿纯白家里。纯白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瞿秋白就利用纯白家中的风琴,边翻译边弹唱,最后将《国际歌》译成中文,在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前,已经有三种译词了,但都不能配着乐谱歌唱,瞿秋白弹着琴,对着俄文





的节奏,合着乐谱,反复弹唱斟酌,终于译成比较满意的唱词。其中“国际”一词,俄文有 6 个音节,译成中文只有两个音节,瞿秋白就使用音译“因特纳雄纳尔”,这样不仅便于歌唱,而且让大家记住歌曲主题。

咱们现在传唱的《国际歌》是在瞿秋白翻译的基础上又作了修订,成为现在更加典范化、朗朗上口的歌词,所以,瞿秋白是第一个最全面翻译《国际歌》的人。

瞿秋白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的古体诗词创作总体来说不是很多,风格上更多地也比较婉约。俗话说,文如其人,瞿秋白气质更多能从他的新体诗歌中体现。

我们来看他作于 1929 年 3 月的新体诗《小小的蓓蕾》:“小小的蓓蕾,含孕着几多生命,陈旧的死灰,几乎不掩没光明。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女儿的钟爱和殷切期望之情。女儿在他的眼中就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孕育着无限的生命力;旧社会旧势力的“死灰”,不能掩没走向光明的新生事物;战场上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山花烂漫,经过风雨磨难的女儿一定会获得新的生活;出身封建家庭的小独伊变成革命的后代并不是“无意中的赤化”,而是革命者爱的结晶。

1925 年初,瞿秋白和杨之华(第二任妻子)几经周折,从沈剑龙家把女儿独伊接出来后,曾对杨之华说:孩子将有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教育她、培养她,使她成为对社会



诗人瞿秋白





有贡献的人。瞿秋白的这首小诗,体现的正是这种真挚高尚的情怀和关爱。

三、身陷囹圄的忧情诗人

瞿秋白的各类诗作一共 82 首,这是我们至今收到的最新数据。这 82 首诗,其实就是瞿秋白一生的写照。我们从诗词中更读到了他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与坚定。



瞿秋白在生命尽头的狱中题照中有这样的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在几个月的牢狱生涯中写下了近万字的《多余的话》,创作了三首旧体古诗,反思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剖析自己的灵魂,倾吐自己的心中郁结。忧心,真情,真实,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其中的《浣溪沙·感怀》(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和集唐人句《七绝·偶成》(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回首十年伶俜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两首诗词,虽不见壮烈激昂,但一样让人怀想起岳飞《满江红》《小重山》和辛弃疾《贺新郎》《水龙吟》般怅然英雄路的感慨悲凉。

另一首《七绝·无题》:“斩断尘缘尽六根,自家且了自家身。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

诗的前两句,是幽默的自嘲和自判:我把一切生的欲望和“尘缘”统统斩断,我选择一个“死”字把自己的血肉之身了结。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现在我已经完





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而这个“我自己”生与死的最后的了断，不是取决于国民党，而是取决于秋白自己。但是，他在生死抉择中，断然放弃了“生”而选择了“死”，就像当年第一次赴俄时坚定不移地“自趋死地”“宁死也当一行”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这两句诗所要表现的并非什么佛学思想或道家学说，也并非消极，而不过是借佛道两家的字面表象，表达更深沉的含义，是“自己且了自家身”，透露出自己“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诗的后两句，是含蓄地讽刺王明之流，曲折地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现状和前途的慨叹、忧虑。当时瞿秋白虽然已身陷囹圄，但他依然感到“心忧”，深感那些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新干部”“新的领导者”“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包打天下”（《多余的话》）是靠不住的。实际上，秋白是用反语讽刺“治国平天下”的“英雄大圣人”王明集团，表明了秋白对政治生涯、对共产主义、对中国与世界难以忘怀的情感。

还有《卜算子·咏梅》：“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在中国传统的文人墨客眼中，梅凌霜傲雪，冰清玉洁，因此，梅一直是文人笔下人格的象征和意趣的指向。以梅入诗，寄情言志，是旧体诗创作的普遍现象。瞿秋白早期诗作《雪意》里面，“犹折梅花伴醉眠”就是一例。



诗人瞿秋白





但这首诗，瞿秋白是借用陆游的《咏梅》原韵，感怀与陆游一样的孤寂，一片丹心无人理解。

诚如他在《多余的话》中写道：“十几年来，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种描述不很符合事实，但十几年来，瞿秋白确实在经受这心灵的煎熬。他渴望从文却选择政治，选择了从政却又盼望着从文。



秋白就义前谈人生快乐之三境界：“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他写的《梦回》七绝：“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有生命中的放下与夙怀未竟的放不下，依然对世间有着诸多美好的留恋。狱中所作诗词，诗人似预见到了生命行将走到尽头，显示出英雄末路的悲凉与无奈，但又分明体现出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这里，我觉得要感谢梁衡，他写的《觅渡，觅渡，渡何处》以及《〈觅渡〉自注》为我们写出了一个真正的瞿秋白：“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真心。秋白不朽。”

瞿秋白在生命的临近终结的最后时刻，在身陷囹圄





的特殊社会空间,一组诗和一本《多余的话》,道出了他在怠倦疲惫中坚守的责任和担忧。他在“忠诚的痛苦”中发出“寂寞此人间”的长叹。在生命的最后,从寂寞、煎熬中摆脱出来,转而从容磊落地把生死置之度外,“身无主”了,喜在“正我逍遙处”,他的心灵、思想可以放飞、自由了。

灿烂之花经历风雨之后,凋谢了,革命总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但只要勇往直前,总有再盛开的时节,芬芳的春天一定又会到来的。

瞿秋白是幸福的,幸福在于他身体失去了自由,心灵却自由了;瞿秋白是勇敢的,勇敢在于他不能走上讲坛,却给我们留下了他真实的心声。

瞿秋白似乎是天生的诗人。他的心是诗化的,他的情感、他的一切精神创造活动、他的全部生涯,那么美尚,那么绚烂夺目,那么高迈激荡、正气浩然、充满诗意。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曾引尼采之“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语。读秋白诗词,时有这种感叹。明快之笔调与沉郁之笔调,往往后者之分量更大,悲慨之美,震撼力更强。

(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



诗人瞿秋白



侯涤,常州市图书馆馆长、副研究员,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副秘书长,撰写《江南一燕——瞿秋白画传》,主编《瞿秋白研究》刊物。

